

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杨莉萍 朱政光

【摘要】 中国社区心理学起步较晚,近几年开始快速发展。首本教材《社区心理学导论》以儒家“五德”为理论基础,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如传统文化如此丰富,仅以儒家“五德”作为理论构建的基础是否有疏漏;儒家“五德”究竟具有哪些内涵;如何将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心理学化”,以便进行有效心理评估等。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实践的两条路径,其一是通过社区心理服务,在基层社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其二是通过提升居民社区感,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助力基层社区建设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理论建构;实践路径

中国的社区心理学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发展缓慢。1989年,华南师范大学冯增俊教授发表了“美国社区心理学概述”一文,那是大陆第一篇以社区心理学为主题的论文。在那之后的十几年中,零星发表了一些介绍西方社区心理学的文章(佐斌,2001;陈永胜、牟丽霞,2007)。另有少量与社区心理学相关的成果发表,内容涉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及犯罪防治、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及生活品质、社会资本、社区意识、邻里关系、社区参与等问题。2012年,杨莉萍和珀金斯发表文章(杨莉萍、珀金斯,2012),对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作了计量学分析,总结了社区心理学中文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区心理学的现状、未来机遇与发展阻碍,是中国社区心理学早期研究的重要文献。

2013年,以西南大学黄希庭和陈红教授为代表,一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者着手筹备成立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9月,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首届学术年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同年10月,中国心理学会十一届八次常务理事会以全票通过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的转正申请。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社区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以及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中国心理学界得到认可。自此之后,部分心理学院开始尝试开设社区心理学课程。2010年,詹姆士·H.道尔顿(James H. Dalton)等著《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第2版)》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这是第一本由西方引入的社区心理学教材。2017年开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套《社区心理学译丛》,包括维多利亚·C.斯科特(Victoria C. Scott)和苏珊·M.沃尔夫(Susan M. Wolfe)的《重建应对创伤的心理弹性:创伤与社区弹性模型》、伊莲·米勒-卡勒斯(Elaine Miller-

杨莉萍,心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7);朱政光,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7)。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Karas)的《公民权与公民参与心理学》等。2018年,默里·莱文(Murray Levine)、道格拉斯·D.珀金斯(Douglas D. Perkins)和戴维·V.珀金斯(David V. Perkins)的《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3版)》翻译出版。2020年,约翰·森继(John Moritsugu)、弗兰克·Y.王(Frank Y. Wong)和凯伦·格拉维尔·达菲(Karen Grover Duffy)的《社区心理学(第4版)》翻译出版。在缺乏中文教材的情况下,这些西方教材一直被当作国内社区心理学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使用。

2021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社区心理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由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6所大学的20位教授参与编写。这是大陆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具有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社区心理学教材。《导论》全书共18章。第1和第2章分别是概论和研究方法;从第3章到第8章致力于理论创新,其中第3章的主题是“社区氛围(Community Climate)”;第4到第8章集中讨论“社区价值(Community Values)”,基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分别建构了仁爱(Benevolence)、正义(Righteousness)、文明(Civilization)、和谐(Harmony)、诚信(Honesty)五项社区价值观;第9至17章对社区服务实践提供指导;第18章是对未来的展望。《导论》从建设中国社区心理学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双重任务,敢于做开路先锋,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话语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初步创立的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框架和体系,《导论》仍遗留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包括理论框架需要完善,基于儒家文化的五种社区价值观还没有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两部分需要进一步统一等。由于参编人员多达20人,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在实践应用部分没能充分贯彻前几章创新的理论。

除上述理论成果之外,近几年在社区心理学专委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该领域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承担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开展跨学科合作攻关研究;制定社区心理服务的规范,对社区心理服务人员开展培训;以及直接下沉基层社区,组织和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等。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两方面对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建构

社区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诞生于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同地区发展迅速,逐渐形成融合了不同地域特色且极具本国文化特征的多种社区心理学模式(Perkins,2009)。相较而言,我国社区心理学起步时间较晚,且在较长时间内主要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社区心理学理论,最多是以中国社区居民作为被试,跨文化检验西方社区心理学的研究结论。虽然不能否认这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区心理学建立之初,但鉴于中西方社会制度、体制和文化层面的根本性差异,将西方社区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经验引入中国,如果不经本土化改造,很难为我国社区心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想范例和有效指导。

以“社区”概念为例。这一概念随社会结构变化及人们观念的变迁不断推陈出新。2011年以前,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区”所下的定义已超过140种,其内含在不同定义中体现了充分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刘玉东,2011)。略去细节性差异,这些定义大体可分为两类,分别被称为功能主义观点和地域主义观点。前者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强调社区的功能性特征;后者认为,社区是在同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历史原因,“社区”在中国大陆被理解为有着清晰边界的地域性实体,具体等同于农村的自然村落或城市的街道居委会辖区。社区作为共同体的一系列功能性特征相对被忽视(杨莉萍、珀金

斯,2012),这意味着中国社区与西方国家的社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又如“社区冲突”。在英语中,“冲突”(Conflict)意为“战斗”(Fight)或“斗争”(Struggle)。美国的“社区冲突”是指特定社会结构框架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与紧张状态,主要指种族冲突。所以,美国社区心理学中对“种族冲突,如种族隔离与废除种族隔离”的讨论虽然很多,但并没有与中文“社区冲突”相匹配的概念。在中国社区背景下,“社区冲突”被定义为“构成社区生活主体的居民及相关群体、组织在面临资源竞争或对社区基本设施进行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分歧”(黄希庭,2021)。相较于西方社区种族冲突的剧烈程度和不可调和性而言,中国的社区冲突大多表现为社区居民因日常琐事引发的邻里矛盾和纠纷(谭梦鸽,2023)。后者在美国社区心理学中大多被理解为“意见分歧”(Dissensus)。搜遍美国社区心理学研究资料,几乎找不到“社区冲突”(Community Conflict)这一主题。鉴于中西方社区在历史发展、分型、管理方式及居民社区意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套用西方社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行不通。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学理论乃是当前社区心理学研究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必要性毫无疑问,重点、难点、关键点在于如何构建。黄希庭教授主张,以儒家“五德”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并在《导论》第4到第8章做了详细阐述。这是目前对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创建。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到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贯倡导“坚定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以及“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要完成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建构必须也只能基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儒家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组织,其中蕴含的关系性思维和关系性自我体现了东方古老的文化理念和哲学思维,而“五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与当前社会所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完成对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传统文化何其丰富,粗略划分就有儒、道、佛三家。仅以儒家文化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是否存在某些疏漏?道学和佛学文化中有没有、有哪些值得社区心理学理论建构吸收的精华部分?第二,仁、义、礼、智、信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导论》中作为理论建构的五章内容(章标题分别为社区仁爱观、社区正义观、社区文明观、社区和谐观、社区诚信观),似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公正、文明、和谐、诚信等联系更为紧密。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与传统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内涵相比,究竟有哪些继承,有哪些发展,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三,如何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加以“心理学化”,以至可以进行有效心理评估?“五德”通过何种机制内化入个体心灵?以及如何以“五德”引导社区文化建设等。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社区心理学研究课题组与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文化专家共同讨论,合作攻关研究,尝试融合儒道佛三家,从中进一步提炼出“关系性自我”“关系性思维”作为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理论构建的基石(杨莉萍,2023)。与此同时,鉴于经典文本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跨学科反复论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郭店楚简》《礼记》《荀子》《传习录》作为文本资料,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逐级编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掘儒家经典文本中对仁、义、礼、智、信的“正解”,采用归纳的方式分别析出“五德”的概念、内涵与结构,形成以“五德”为核心内容的能够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概念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基于“五德”的心理内涵和结构,分别编制具有较高信效度指标的社区仁爱、社区正义、社区礼秩、社区智慧、社区诚信量表,用于后续对社区进行评估,以及进一步纳入更多影响因素做复杂模型检验(亓立东,2024)。

基于上述研究,对《导论》中作为理论构建的五章内容作进一步思考,发现其中有些概念,如基于儒家之“礼”的“社区文明”、基于儒家之“智”的“社区和谐”等,仍需做进一步研究。以儒家“五德”作为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理论建构的基础,首先要以“社区仁爱”为核心。“五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仁爱”又是“五常”的核心,因此是核心中的核心。倡导社区仁爱重点在于营造邻里之间相互理解与包容、关心与支持的社区价值观念和 psychological 氛围。其次要奉行“社区正义”。“义”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行为准则。奉行社区正义意味着居民之间相互交往和处事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不因一己私利破坏社区公共利益和社区秩序,力求维护社区公平和正义。第三要遵守“社区礼秩”。“礼”是社会规范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遵守社区礼秩意味着提升社区居民的个人修养和素质,遵守各种公序良俗,接受多样性,尊重异己者。第四要提升“社区智慧”。“智”在古代指明辨是非的智慧和能力,重点是知人之智,知己之智和知天之智。提升社区智慧应鼓励社区居民学会理性思考,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在遇到矛盾纠纷时,善于用智慧解决问题,避免采取极端行为,或被谣言和偏见所蒙蔽。第五要落实“社区诚信”。“信”的本质是为人守信和对人信任。落实社区诚信意味着在社区生活中做到言出必行,言行一致,以诚相待,相互信任。

二、实践路径之一:通过社区心理服务,在基层社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对于社区心理学而言,最重要的实践是在基层社区开展社区心理服务。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6)、《“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2019)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要求“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当前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的现状,在基层社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必须突破几种思维局限性,实现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的对象、重点和方式的重大转变。

第一,社区心理服务的对象不应局限于少数有心理问题的个体,而应覆盖社区全体居民。在全民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每个社区居民都有获得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权利。因此,社区心理服务应从重点人群转变为全员服务。前者往往是带着诉求来寻求服务的,因此现实的社区心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医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心理工作者驻守在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站,等待来访者上门自述其心理问题或诉求,再提供相应的服务。在基层社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需要社区心理工作者走出工作站,主动了解和掌握不同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结合社区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心理服务方案。通过开展全面系统的专业化社区心理服务,促进全体居民的心理健康。

由于不同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角色或身份、地位、处境不同,所需要的心理健康服务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制定社区心理服务方案首先要考虑年龄因素,如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主要提供有关学业压力、亲子关系、身心成长等方面的心理科普及社会支持;对于成年社区居民,需要缓解工作压力、调解家庭矛盾、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服务;针对老年居民,则应关注子女孝亲或由退休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以及因与外部社会长期脱节造成的孤独、易怒、抑郁等老年心理问题。除了年龄因素,社区心理服务还应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低保家庭、外来务工人员等,针对他们可能面临的社会偏见、身体或心理上的特殊需求以及适应新环境的困难等,制定特殊的社区心理服务方案。此外,社区心理服务还要关注某些特殊身份居民,例如有吸毒经历的人员,有邪教参与史的人员,以及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等。对这

些居民及其家属必须随时关注,并及时提供必要的社区心理支持和干预。

第二,社区心理服务不能只针对个体水平的心理问题,还要关注群体和社区水平的心理问题。探讨这个问题需要回溯心理学的学科史。心理学中长期存在着向自然科学靠拢乃至自然科学崇拜的倾向,表现为认知神经科学在心理学中的极端兴盛。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专业分化,划分越细被认为专业水平越高。心理学吸收了自然科学专业划分的特点和观念,倾向于在个体心理甚至更加微观的层面开展研究,如将个体心理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单元,包括感知、记忆、思维、性格、能力、气质、本我、自我、超我等。但事实上,人的心理是一个整体,感知、记忆、思维不可能像物理现象那样被明确分割。因此,心理学必须以整体、动态、系统观念克服元素主义倾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倡导,全面贯彻“大健康”理念应以基层社区为重点,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如果社区心理学的视野始终局限于个体心理水平,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学科价值。因为健康不仅包括个体身心健康,还包括超越个体层面的组织(社区)健康和社会健康(吕小康,2020)。这意味着社区心理学参与健康社区建设,不仅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提供心理咨询治疗服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还要在群体和社区心理层面开展工作。

就群体层面而言,不同民族、不同来源、不同身份、不同文化水平或社会地位的社区居民,既有着共同的心理需求和心理问题,又与其他群体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这些心理需求的满足、心理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互动过程常常需要心理学专业人员介入。就社区层面而言,社区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由普通业主、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小区居委会、街道管委会构成,各部分之间既相互协调,又隐含着各种张力。这些社区环境特点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因此,将居民心理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考虑,社区心理服务就不能局限于居民个人的心理问题,还需关注社区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文化氛围等各种可能影响居民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区心理氛围的因素。通过研究和解决群体层面以及社区层面的心理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心理安全感和人际和谐体验,打造心理健康社区。

第三,社区心理服务的方式不应局限于心理咨询和治疗,还应纳入心理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提出了全新的“大健康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面健康素养”。这种“大健康观”是对旧的健康观念的创新和发展,即健康不不只是指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心理、社交和灵性四个方面的全人照顾与和谐统一。

在社区心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心理学工作者主要采取心理健康的医疗模式,进入社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现阶段社区心理学在落实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促进居民心理健康方面,需要同时关注消极心理问题的解决与积极心理健康的促进。其重心应从个体心理咨询和治疗转变为心理问题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为实现这一目标,社区心理服务需要广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倡导积极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整体提升。同时,还需要与社区相关机构和组织合作,建立和健全居民心理健康支持网络,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生活全方位、居民生命全历程的心理健康服务。目前,社区心理服务工作在乡村社区并未得到普及,多数城市社区也尚未形成一套长期有序、系统化的、较为成熟完善的社区心理服务工作机制。在基层社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社区心理学肩负一项重要任务,即在城乡社区广泛建立心理服务中心或工作站,统筹规划并组织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开展社区心理预防两方面的工作,直至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构筑起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工作的完整体系。

三、实践路径之二:助力基层社区建设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与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同步,社区心理学对基层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探索也明显加强。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利益、解决民生问题等诸多职能,基层社区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区文化建设,重塑社区家庭与邻里关系,培育社区意识,助力基层社区建设,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区心理学深入社区实践的另一条路径。

社区心理实践需要承担两方面任务:一是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二是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心理学致力于研究社区居民心理与社区环境的关系,二者具有高度统一性(莱文等,2018)。在消极冷漠的社区文化环境中,单方面依靠社区心理服务,很难维持居民整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伴随改革开放,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个体理性主义的涌入和泛滥是当前中国社区和社会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传统文化奉行关系性自我和关系性思维,与西方个体理性主义价值观形成对立(杨莉萍,2023)。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必须复兴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理论建构的指导下,以儒家“五德”促进社区仁爱、社区正义、社区礼秩、社区智慧、社区诚信文化建设,打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社区文化环境。

社区意识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共同体观念,反映了社区居民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区这个共同体强烈的归属感及认同感,它是个体与社区得以紧密结合的基本条件。与之最接近的概念是“社区感”。McMillan 和 Chavis(1986)提出,社区感包含成员资格、影响力、整合与满足需求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四种要素。社区居民的社区感是社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培育社区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社区心理实践的重要任务。

我国社区居民的社区感水平普遍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长期实施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理体制,使社区居民养成了等待和服从政府指令的心理惯性,对于社区参与和社区行动普遍缺乏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随着住房体制改革及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单位社区”转变为“商品房小区”,社区居民身份的异质性日益增强。业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各异,心理需要与诉求也各不相同,近在咫尺的邻里很多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社区冲突与矛盾日益增多,严重阻碍了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和社区归属感的培育(杨莉萍、珀金斯,2012)。如何快速有效地减少和解决社区冲突,将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社区,是社区心理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频繁发生的社区冲突是缺乏社区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之一。社区冲突本质上是拥有不同利益和目标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抗争,它既可能发生在社区居民、群体或组织机构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各种社区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蔡禾,2005)。影响社区冲突的主要因素包括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机制两个方面。其中,社区居民要素主要体现在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文化异质引发的行为错位,贫富差距导致的心理失衡与行为失范等(张平、刘伟民,2021)。社区组织机制则主要表现为冲突治理组织机构不健全,冲突治理体制机制不通畅,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手段单一等(原珂,李少抒,2018)。社区心理学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社区冲突的研究,初步提出了一些社区冲突化解策略,尚有待在后续社区心理实践工作中加以验证(黄希庭,2021)。

社区心理学理应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但现阶段国内社区心理学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学术层面。研究者热衷于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社区成员的某一项或几项心理指标的相关或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社区”在其中充其量只是一个背景,或者以西方社区心理学已有的概念或模型为根据,在中国社区居民中加以验证。这些研究固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旦问到相关社区心

理工作应如何开展,研究者往往难以开口说出个子丑寅卯。此处是社区心理学研究最易被卡住的瓶颈。一方面,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心理学家对于有涉政风险的社会现实问题大多持回避态度;另一方面,受制于心理学中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心理学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存有执念,而这些在时刻变化发展着的现实的社区环境中往往很难实现(杨莉萍,2015)。

社区心理实践需要深度介入基层社区,在促进社区心理问题解决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多取向、多途径的研究原则,探索和倡导适合于社区心理问题解决方法体系。一方面保留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等传统的实证方法,另一方面纳入深度访谈、焦点团体、叙事研究、扎根理论、田野研究、行动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以促进社区心理学研究向社区生活的回归(黄希庭、岳童,2022;孟维杰,2017;杨莉萍,2015)。研究方法、方式的创新要求变革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变革,社会实践效度应被纳入社区心理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那些看上去很科学,但毫无社会实践效用的心理学研究,至少在社区心理学中,应该让位于真正能够反映和解决社区心理问题,产生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有效指导社区心理工作实践那样一类研究。

参考文献:

- 蔡禾,2005:《社区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陈永胜、牟丽霞,2007:《西方社区感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冯增俊,1989:《美国社区心理学概述》,《心理学动态》第2期。
- 黄希庭,2021:《社区心理学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黄希庭、岳童,2022:《让心理学走向大众——专访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教师教育学报》第1期。
- 刘玉东,2011:《社区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质内涵——兼论中西方释义差异之根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吕小康,2020-02-07:《发挥心理学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光明日报》第11版。
- 莱文、珀金斯、珀金斯,2018:《社区心理学原理:观点与应用(第三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孟维杰,2017:《社区心理学方法论扩展性探索》,《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
- 亓立东,2024:《仁爱价值观的心理学诠释及对城市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
- 谭梦鸽,2023:《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混合研究方法的心理学探索》,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
- 维多利亚·C.斯科特、苏珊·M.沃尔夫,2017:《社区心理学实践基础》,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莉萍,2015:《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莉萍、珀金斯,2012:《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发展的现状、困难与机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
- 杨莉萍,2023-11-22:《基于关系性思维构建中国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
- 伊莲·米勒-卡勒斯,2017:《公民权与公民参与心理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原珂、李少抒,2018:《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问题与策略探究》,《学习论坛》第7期。
- 约翰·森继、弗兰克·Y.王、凯伦·格拉维尔·达菲,2020:《社区心理学(第四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詹姆士·H.道尔顿、毛瑞斯·J.伊莱亚斯、阿伯汉姆·万德斯曼,2010:《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平、刘伟民,2021:《城市社区矛盾纠纷:类型阐释、生成机理与纾解之道》,《四川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佐斌,2001:《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及述评》,《心理学动态》第1期。

McMillan, D. W. & D. M. Chavis,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4, No. 1, pp. 6 – 23.

Perkins, D. D. , 2009,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sycholog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44, No. 1 – 2, pp. 76 – 79.

Yang, L. , J. Chen & M. Tan, et al. , 2022, "The first indigenous textbook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published in China", *The Community Psychologist* , Vol. 55, No. 1, pp. 30 – 33.

(责任编辑: 蒋永华)

Community Psych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YANG Liping, ZHU Zhengguang

Abstract: Community psychology in China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but has begun to develop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first textbook in this area,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Psychology*, uses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the "Five Virtues"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itially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unique to Chinese community psycholog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discussed, such as whether it is an oversight to bas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olely on the Confucian "Five Virtues", given the rich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at exactly are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Five Virtues"? How ca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of *ren* 仁 (benevolence), *yi* 义 (righteousness), *li* 礼 (propriety), *zhi* 智 (wisdom), and *xin* 信 (trustworthiness) be "psychologized" for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There are two paths for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is to implement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t the primary level through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ervices. The second is to enhance resident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foster a sense of community cohe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community psych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path

About the authors: YANG Liping, PhD in Psycholog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ZHU Zhengguang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